

实施“1331 工程” 推进“双一流”建设

前沿·思考

第 2 期

山西省教育厅 1331 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8 日

本期要目

-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
-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 双一流：走出“重金挖人”路径依赖
- “双一流”高校遴选是否需要照顾区域教育平衡？
- “排名工程”造就“一流大学”？
- 各省“双一流”建设方案综述

目 录

“双一流”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	1
----------------------	---

理论探索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7
--------------------------	---

专家访谈

双一流：走出“重金挖人”路径依赖 ——访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	11
---------------------------------	----

焦点热议

“双一流”高校遴选是否需要照顾区域教育平衡？	14
“排名工程”造就“一流大学”？	16

他山之石

各地“双一流”建设方案综述	22
---------------	----

（刊载内容不代表编者观点，供领导参阅）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 阎凤桥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双一流”建设可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具体内容。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具有“后发外生型”和“集中管理型”的特征，两种制度共同作用表现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的追赶和跨越式发展模式，两种制度约束导致在大学制度建设上表层目标与深层目标实现程度不同步，即出现所谓的“脱序”现象。

最新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项目与之前“211工程”“985工程”“2011协同创新计划”等各类工程的侧重有所不同，它将一流学科提到与一流大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将其视为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可以说，该项目的开放度和包容性比以前都有所提高，一些高校即使难以从总体上将世界一流作为发展目标，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在某些优势学科上单兵独进，参与全国性的竞争。但是，从实质上看，“双一流”建设与其他项目也有共同之处，它仍然将世界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以世界一流作为标杆，从而在对比过程中努力将中国的一些大学和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首先意涵着存在一流的学科和学校，进而言之，该项目还意味着将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发展的绝对水平上，而有可能淡化办学条件、具体情境、是否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等因素，因为后者是难以衡量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意涵和做法是否成立，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包括“双一流”建设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

的特点。与“先发内生型”国家的发展态势相比，“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发展路径上容易采取“追赶”业已进入现代化之列国家的策略和作法，所谓“追赶”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侧重于横向比较而忽视情境约束和特定问题导向。再从管理体制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属于集权型，或者说举国体制。“双一流”建设在较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学校完全自主的行为。综上所述，后发外生型、以他者为榜样（或者为对手）、追赶策略、举国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精英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制度背景。

一、追赶心态与学术发展轨迹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清末民初随着救亡图存开启的。由于延续千年之久的官僚体制，更是由于在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共和国时的特殊情形，建立了所谓的党国体制，即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其表现形式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近代史上“落后”与“挨打”的历史，以及为了扭转内弱外辱的局面，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目标时产生了追赶西方国家的心态和行为。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力争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上面的简单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保持着独立性，但是在经济基础领域则是不断追赶西方国家的历程。追赶不仅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制定取向，也在无意之中变成了一种国民心态和社会合法性，辐射到包括学术在内的多个领域。

学术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学术系统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决定着中国模仿和学习对象国的变化。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先是欧美，然后是前苏联，最后又回到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先贤们曾经倡导“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是实际上“上法三代”只是一个说法，落在实处的则是“旁采泰西”，造成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保留。

二、中国学术与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是一个工作术语，而不是一个学术术语。从学术角度看，“世界一流”的说法成立与否，因学科而异。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而表现出“进步性”的特点，推陈出新是其表现形式，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取代旧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学术研究做前沿与非前沿的区分，因此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研究水平，适合于做相互比较。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学科排行活动就有意义，学科排名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科则更多地涉及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和文​​化系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具有同质性，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任何社会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造成以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具有恒久性的特征。因此，对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言，所谓学术“前沿”和“过时”的说法不太成立。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具有部分的可比性和部分的不可比性。学科的可比性既如此，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大学的可比性更是如此。

总之，在大学和学科部分可比和部分不可比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对“双一流”的提法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具体讲，世界一流建设目标对于自然科学和理工类大学而言，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人文学科和综合大学而言，现实指导意义就比较弱。

基于上述学科和大学属性特征基础，我们来探讨中国学术水平与世

界一流水准有多大的差距。在过去一些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某些研究方向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和《科学》这样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学术论文数量是衡量学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衡量科学研究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原创性”，其中理论创新又是最高层次的学术创新。我们在这方面的学术发展水平如何呢？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专门系统的研究。

对于人文和社会学科来说，要去做国际比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许多西方国家的学科建制与我国的学科建制不同，分权制国家往往没有一个国家统一和固定的学科建制，没有官方规定好的学科目录以及按此学科目录建立起来的招生和院系设置体系，更没有官方组织的学科评估及根据评估结果分配资源的情况。这造成很难找到与我们完全对应的学科建制。其次，西方国家的学术系统建立在教授个人学术专长基础上，而教授的跨校流动性很强，所以各个大学学科发展的变动性也较强。第三，作为学术制度的一个表现形式，西方学术体系重视学术的个体性和特质性，每一个学者都尽量避免与他人雷同，努力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与此不同，我们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大家都在从事比较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工作。第四，在一些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上，我们缺少与国外学术机构和学者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对标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上面四点原因，既可视为确定人文和社科对标机构的困难所在，也可视为是比较不同学科之间的困难所在。

三、后发外生型国家学术发展的误区

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系统而言，大学制度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斷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大学学术领袖对于中西大学制度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异同。作为一种学术

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属于大学制度的后发外生型国家。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从理论上讲，后发优势表现在，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不用自己去探索和创新，因此发展成本低，发展速度快；而劣势在于，模仿成为一种发展机制，路径依赖原理作用的结果导致缺少制度创新的原动力，在外来的制度与本土的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容易出现“内卷式”状况（即有数量增长而无实质发展）、形似而神异或者说外表与内涵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下面，从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容易产生的误区视角，略加阐述。

误区 1：形式模仿。对比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发展态势：伯克利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而仅仅是定位于服务加州的发展，但是在履行这个看似渺小使命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卓越，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所有世界影响的大学。与之不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优秀大学始终瞄准世界一流目标，而不把服务于所在社会作为目的。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逻辑，前者注重于“脚踏实地”，而后者倾向于“仰望星空”。与伯克利的内在激励、内涵发展模式相比，北大采取的则是外在激励、外延发展模式。

误区 2：忽视制度建设。从干预方式角度看，包括大学制度在内的制度形成有人为设计和自然演化两种不同方式。一些学者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后指出，通过自然演化形式而形成的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是最不易被模仿的。显然，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大学容易学到怕是国外大学表层的东西，而深层次的制度内涵则不容易学。如果我们从制度视角审视世界一流大学，它不仅是一些数量指标的简单集合，更是制度的复合集合，由外在的发展形式到内在的发展机制、价值体系构成的统一体，数量指标容易达到，而制度内涵不容易建立。因此，实

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艰巨性不容低估。对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无法用一些客观的指标加以判断，不得不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而主观评价主要依靠他评而不是自评。因此，中国的大学和学科是否达到世界一流，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制定一份一流大学和学科目标实现的时间进程表。

误区 3：跨越式发展，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后发外生型模式常常与跨越式发展模式相伴随，尤其在集权体制下两者容易共生。对于后发外生者而言，容易看到表面的目标并低估实现总体目标的难度，所以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容易出现激进，以跨越式作为制定激进政策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看，跨越式发展模式是以牺牲历史承继性和自洽性为代价的，容易产生知识创造和传递上囫圇吞枣、食洋不化的问题。

误区 4：以牺牲多数高校利益为代价。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恰当地处理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关系的问题。“双一流”属于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部分。在集中财力投入精英部分时，是否会削弱大众部分的基础建设？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误区 5：树立标杆，不利于实现多样化。办学特色是高等教育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又经常被忽视。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上是在树立标杆，这些标杆对其他学科和大学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可能削弱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的特色。

社会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从浅至深分别是：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思想行为层次。一般而言，浅层次的现代化目标容易实现，而深层次的现代化目标则较难实现。根据实现现代化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国家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类型或者形态。先发内生型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容易做到现代化三个层面的同步发展，而后发外生型国家则可能出现三个层面的不同步发展，即所谓的“脱序”。在集权管理方式下，后发外生型国家的追赶心态和容易采纳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侧重

于强调器物层面的建设，而忽视制度建设，因此容易出现“脱序”问题。大学是一种制度性的组织，制度是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的积淀赋予大学制度以独特的内涵，需要长时间涵养才能获得，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跨越实现。（节选）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学科建设 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倪亚红 王运来

人才培养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是建设一流学科的要义之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贯穿大学治理始终，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涌现进一步规约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知识的整合创新和人才培养已成为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秉持价值理性教育观，实现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自觉遵从，坚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既是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精要所在，也是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大学的现实治理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重视人才培养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高等教育吊诡，严重影响我国“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全面达成。

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对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科建设的规约

目前学界一般把知识的生产模式分为三种：一是基于牛顿模式，以单学科研究为主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 1；二是在应用环境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研究绩效和社会作用的知识生产模式 2；三是以“集群(cluster)”“网络(network)”和“生态系统(ecosystem)”为核心要件和概念的知识生产模式 3。这其中，知识生产模式 2 获得了

较为一致认同。在知识生产模式 2 中，大学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上的垄断排他地位被彻底颠覆，大学“象牙塔”式的科研范式也随之分崩离析。作为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呼应，大学学科的建设已然产生了新的规约。这使得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学科建设越来越离不开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与统一。

依据模式 2 的知识生产理论，学科知识主要来源于人在具体情境中的知识应用，人才是学科知识之所以产生的渊源。也就是说，知识是学科建设的主要建筑材料，人才是知识产生的源泉。这样一来，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所应遵循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关系链也随之产生：理论上，现代一流大学的建设绝对离不开一流学科的建设，一流学科的建设更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与创新，而人才则是学科知识的终极来源；实践上，一流的学科着力于一流人才的培养，一流人才的科学研究推动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又为一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由此可见，人才培养和知识的积累创新是学科建设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二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生产模式演进对“双一流”建设的必然规约。

二、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实践统一是我国当前教育生态下大学治理的逻辑起点

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进而全面实现大学的诸项职能是我国大学当前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治理大逻辑，而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统一正是贯穿我国大学治理逻辑结构始终的逻辑起点，二者的实践统一是决定大学职能实现的关键因素。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了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大学的发展水平也直接左右着我国大学对国际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和占有，对“双一流”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有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我国大学现阶段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严重削弱了我国大学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凝聚力。教育部门户网

站的统计报告表明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呈上升趋势，且本科留学生的人数增速迅猛。高等教育资源的大量流失是对我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极大阻滞，非常不利于我国当前“双一流”战略目标的实现。

鉴于所处的复杂内外部教育生态环境，我国的大学治理如果处理不好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实现二者在教育实践中的统一，将无法保证大学职能的顺利实现。这是因为，一流的大学才会拥有一流的大学职能。一流大学只有通过一流学科的建设才能带来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而高水平的人才才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才能够为一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才有可能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一系列因果循环的逻辑关系链条的形成全都依赖于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相统一这一逻辑起点。显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委实是我国大学“双一流”战略发展中互为充要条件的两大教育命题。

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1. 基于理性观和权力理论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实践中分裂的批判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大学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二者所涉及的众多教育行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理性观（主要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直接影响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的交融统一。

从价值理性的教育观出发，高等教育理念应更多考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久意义。在这样的价值理性指导之下，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成为学科建设的双重内核是理论上的必然，二者的实践统一也就成了恪守大学理性的水到渠成。

除了理性观之外，大学权力系统的运行状况也严重影响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大学在工具理性教育观的指导下自然会在学科建设方面选择自觉服从的权力维度，而在人才培养方面选择明确使用的权力维度，二者权力行使效果迥异，人才培养的成效要远远小于学科

建设的成效，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扩大，二者也难以实现在教育实践中的交融与统一。大学的治理权力散布并不断传递于大学及大学各部门。大学及大学各部门也从本部门的“利益”算计出发来决定在自己所处位置上权力使用和传递方式。正是这种“利益”判断的不同和基于判断的权力运用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权力使用（大学治理行为）的不同效果。

2.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统一

首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交融统一是统辖于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下的交融统一。“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培养国民对国家的深厚眷恋之情，以捍卫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利益作为行动指南”，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交融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和前提。学科建设既要为知识创新服务，更要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学科发展本身并不足以体现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作为学科建设主体的人才是教育中国家主义思想的现实载体。我国大学学科文化既要怀有中国文化的深沉气质，深深打上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烙印，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又要虚怀若谷地吸纳世界文化的璀璨精华。学科文化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而得以实现的。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价值理性的教育观，以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为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知识和培养人才。

其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交融统一的本质是基于共同素养构建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科建设主要涉及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人才培养主要涉及与教学相关的知识的传承，二者都与知识密切相关，且在结构和内涵上都具有比较相似的学科素养和人才素养构成。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教育实践中交融统一的实践之路本质上就是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科学研究是教学之所以存在的不竭源泉，而教学为科学研究的更好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教学与科研失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必将走向消亡。大学之谓大学，就必须要做到科研与教学的统一。失去了

二者的平衡，大学充其量也只能是一所极度平庸的大学，要么沦为是一所苟延残喘的教学机构，要么成为全无持续发展可言的研究所。反之，具有科研性的教学和融合教学的科研的统一一定会促进一流学科建设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统一。（节选）

双一流：走出“重金挖人”路径依赖 ——访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

中国教育报记者 储召生

对一所大学而言，每一个学生都是“最重要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广大学生和教师的群众基础很重要，国家和高校都要重视人均教学资源的提升，不能把有限的办学资源只给学校的几个人才，每个大学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

中国教育报：最近两年围绕“双一流”建设，一些地方大学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以吸引人才，很多人担心会引起“挖人大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顾佩华：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用的都是西方的考核指标。中国搞“双一流”建设，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做自己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对学校来说，我们也不可能根据某一个指标去办学，否则大家都搞成一样了。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校为了追求指标漂亮，就把钱集中起来，搞几个人才。“重金挖人”就属于此类。培养人是大学最本质的属性，对一所大学而言，每一个学生都是“最重要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广大学生和教师的群众基础很重要，国家和高校都要重视人均教学资源

的提升，不能把有限的办学资源给学校的几个人才，而生均的教育资金却非常低。

中国教育报：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实施办法，以5年为一个周期提速“双一流”建设。但也有学者认为有些操之过急，因为欧美“双一流”高校都有长期渐进的过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顾佩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世界银行有个统计，20世纪30年代，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90年；到了2006年，变成了15年。不是这些企业做得不好，是整个时代变了。谷歌、脸书、苹果、阿里巴巴等企业，把整个商业体系都改变了。

一流大学建设也一样。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考察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确实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但这对中国国情和当今教育发展的现实来说并不一定很合适，因为需要等太长时间了。我认为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是非常正确的。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自己培养各方面的精英人才，比如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企业家、各类领袖人才等，不能让青年人都到国外去学习，我们必须自己培养，也一定能够培养。此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一流创新和颠覆性的成果以及伟大的思想。

中国教育报：我注意到汕头大学提出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你们会如何做？

顾佩华：国情不同、校情不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应该是不一样的。政府所能提供的，主要是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比如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大学建设的内部条件，比如优秀大学文化建设、战略规划制定等，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每个大学都要有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

汕头大学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田”。2001年以来，汕头大学的阳光财务制度改革、系统整合医学教育改革、CDIO工程教育改革、

年薪制改革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得到了推广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都在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如斯坦福首创“开环大学”模式、麻省理工学院激励校友和学生创新创业，下一步汕头大学也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通过国际合作如与 GTIIT（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简称广以）双聘等，创造高水平科研成果，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培养高水平人才。

中国教育报：汕头大学给人感觉是一个很洋气的学校，不仅教师和学生中有很多外国人，执行校长、学院院长都可以由外籍人士担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顾佩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国际化的大学，都是在全世界找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汕头大学这些年一直强调要给教师和学生一个“走出去”的机会，学生有一个短期境外访学的经历，教师有一个短期访问和国际合作的经历，再回来学习和工作，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让教师和学生“走出去”，去了解别人的文化和社会实情，对于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理性和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同时我们也要善于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包括人才。国际化办学不是把别人变成我，也不是把我变成别人，而是要有意识地增加对多元文化了解和理解。因为现在大学生毕业以后，参与的竞争都将是国际的竞争。

中国教育报：8年前，我来汕大采访时有一个感受，与深圳、浦东等特区相比，汕头的发展速度太慢了，甚至比不上内地一些地方。这会影 响汕头大学的发展吗？

顾佩华：这涉及大学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城市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大学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汕头大学也是汕头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做到与汕头市共成长。比如练江的水污染治理，我们应该引进、组建最先进的团队，建设练江治理中心等科研平台，聚集一大批企业和行业的力量，为潮汕地区水污染治理提供服务。练江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学科发展和科研创新水平也就上去了。全国还有那么多

的江河湖海需要治理，不愁我们没有项目可做，也可以去争取国际项目。

中国教育报：今年也是您全职回国到汕头大学的第 11 个年头。您对地方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有什么建议？

顾佩华：地方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的存在，主要是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地方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要纳入地方创新发展的大系统中，把地方发展中的问题，作为大学科研的动力。国家创新体系中需要各种人才，每个大学都要有自己的定位，都可以办出特色。（节选）

“双一流”高校遴选是否需要照顾 区域教育平衡？

中国青年报记者 叶雨婷 何林璘 张帅祯

2016 年以来，全国高校最关注的词语非“双一流”莫属。仅从 3 月底至今，各地的支持计划就层出不穷：河南省提出将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争创“双一流”；山东省财政下达 2017 年高校“双一流”建设奖补资金 7.3 亿元；福建省计划每年安排 16 亿元用于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首轮共 80 亿元……

如何能够搭上“双一流”的快车，不仅成为众多高校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

“双一流”是否需要照顾区域教育平衡？

“双一流”，也就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被列入 2017 年的教育工作要点。

众所周知，“985”“211”工程成就了一批优秀高校。然而一直以来，不少人对其分布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一些省份甚至连一所“985”

高校都没有，造成了教育资源稀缺、人才外流等问题。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原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指出，西部高校人才流失等问题导致中西部高校与部属院校、经济发达高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他向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建议应以“双一流”为契机破解区域教育失衡。

黄德宽建议，在建设“双一流”的同时，应指导和支持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一流高校和特色学科，对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的地方高校和学科，中央财政要加大经费转移支付比例，政策上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国家遴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制定‘双一流’认定标准时，既要体现‘世界标准’，也要坚持‘中国特色。

关键在于如何评定？

如何挤进“双一流”的名单之内，如今已经成为各地高校的首要任务，“双一流”高校通过什么方式进行评选，未来这一名单是否应像“985”“211”一样长期固定，都成为了高校关注的焦点。

对于如何遴选“双一流”建设名单，陈宝生表示，为了避免成为“211”和“985”建设的翻版，“双一流”建设明确了遴选范围，确定了公平竞争的原则。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将被平等对待，通过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等进行遴选。

在黄德宽看来，在聘请“双一流”认定专家时，要注意聘请一定比例的了解实际情况的高水平地方院校的专家，以保证相关评价原则和标准能够落实到具体的评价活动中。另外要加大对“双一流”建设的监督和督察力度，严防“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出现高校新一轮的盲目攀比和利益争夺，以致脱离“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追求。要加强对有关部门的监督，防止少数人以权谋私和滋生新的腐败，确保“双一流”建设的良好政治生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左东岭认为，如果“双一流”建设仍然以

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院士等高层次人才数量为依据来排名，那么人才抢夺大战在所难免。左东岭指出，现在人才流动无序的根本在于，学校不考虑流动的人才是否对学科建设有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增加一顶“帽子”。因此，“双一流”的评选不能“数帽子”。“双一流”建设要重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塑造，为人才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朱和平表示，“双一流”的评选应该把“评”和“建”分开。朱和平指出，我国很多的“一流”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建起来的。如今我国仍有很多领域是急需建设的，比如说材料专业、基础理论研究、电子芯片、核心器件、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航海发动机等，但他们和国际一流差距很大，这些领域应该评，也应该建。

“双一流”不是分蛋糕的计划

不少专家指出，“双一流”的关键在于“世界一流”，而这“世界”二字则定位了“双一流”建设的国际化方向。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双一流”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扶持地方高校建设，而是为了让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更高。“双一流”不是分蛋糕的计划，建设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把以前的“糟粕”去掉，让更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成长起来，通过深化改革，让更多的大学生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王树国认为，放眼世界，我国各大高校实际上处在一个相似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的位置，因此要提高整体实力，也是提出“双一流”建设的背景所在。（节选）

“排名工程”造就“一流大学”？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二民

在“双一流”战略的制度框架下，考察建设绩效的“第三方评估”

被多次提及。盛行多年的大学排行榜，能扛起“评估”一流大学的大旗吗？

QS 全球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还在热议，THES 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学排行榜又出来“抢头条”。这段时间，不同版本的大学排行榜走马灯般登台亮相，让人眼花缭乱。而在一些地方对接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战略的方案中，甚至提及进入世界 30 强、国内 100 强等排名目标。轮番“大战”的大学排行榜，扰动着中国高等教育圈本就不平静的“一池春水”。

从 1987 年发表在《科技日报》上的国内第一份大学排行榜算起，中国的大学排行榜已接近“三十而立”；即使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闻名世界的 AR-WU 排名面世的 2003 年算起，中国大学排行榜也走过 13 个年头。如今，版本众多的大学排行榜依然吸引着大学管理者和学生们的关注。与之相伴的是，针对排行榜的争议乃至质疑多年仍未消退：大学排行榜究竟是客观评估还只是“排名游戏”背后的生意？大学排行榜对大学建设，是福还是祸？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多份知名大学排行榜发现，评估指标有偏差、评估数据不透明、多类型高校混合排名等被质疑的缺陷依然存在，而这些有可能会给大学管理者提供不尽合理的“指导”信息。

不过，多名教育研究者表示，目前国内高校对排行榜的态度已从狂热的追捧过渡到反思阶段，仅将大学排名作为办学成效的参考之一；而随着指标数据的公开和大学排名机构的调整完善，大学排行榜将越来越接近大学真实的情况。

在“双一流”战略的制度框架下，考察建设绩效的“第三方评估”被多次提及。盛行多年的大学排行榜，能扛起“评估”一流大学的大旗吗？

“热闹”的大学排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目前在国内的高等教育圈，被认为比较权威的大学排行榜就有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世界大学排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THES)世界大学排名、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USNWR)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这是知名的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同时还包含多个子排行榜，被世界众多高校公认为“一流大学”的参考标准。在前述四大世界性排行榜之外，各有特色的国内高校排名也层出不穷。早些年，国内大学排行榜已呈现网大版、中国校友会版和武书连版“三足鼎立”；咨询机构麦可思的大学排行榜随后强势介入，形成“四小虎”的竞争格局。近年来，更多的科研机构、商业咨询机构意图在“大学排行榜”上分得一杯羹。比如，腾讯教育就在2015年联合最好大学网，发布“中国最好大学排名”。除了综合榜单外，毕业生就业薪酬排行榜、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中国最美校园、中国最受外国政要青睐大学等五花八门的榜单，占据着报刊的显要位置，同时在社交媒体中转发发酵，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热衷大学排行榜的，还有各大院校。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注意到一个细节，近年来热度不减的大学排行榜，无形之中给不少大学管理者以巨大的压力。一些大学的校长常年盯着一些知名的大学排行榜看，不断留意学校排名的变化。

“如果前进几名，自然值得高兴；如果下滑得很厉害，那么校长们可能就要被质疑，学校的治理是不是出现问题了。”他这样分析某些治校者的心态，“所以校长们在招生手册印的宣传，印上的往往都是对学校最有利的排行榜。”

武汉大学从事高校评估研究的博士董克表示，院校之间需要通过与国内乃至世界院校的对比，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以确定努力的方向；

而政府部门需要从多种渠道评估院校的办学绩效：大学排行榜又回应了这两方面的需求。

推动院校之间的“对比”，事实上也是不少大学排行榜设计者的初衷。2003年面世的AR-WU排名，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研究者为服务985、211工程而设计。AR-WU设计者的目的是，通过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对比，以了解国内高校发展的不足，为国内高校的发展做参考。而董克所在研究团队推出的武大版中国大学排名，始于《中国青年报》借鉴USNWR排名的第三方委托项目，其目的也是通过“排名”的方式为高校发展做参考。

政府同样需要这样的“对比”数据。同济大学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分析，随着一批又一批重点建设的投入，政府存在如何评价和肯定大学的问题。排名的结果提供了一定的标杆和依据，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接受，有时也会向院校传达重视大学排行榜的信息。对于很多地方性院校而言，在排行榜上进不去，主管部门就把压力传递下来，有某种公共问责的味道。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地方院校越来越重视和参与大学排行榜。“如果把大学排行榜取消掉，暂时也没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一个困境。”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热闹之中，“看排名、选学校”正在为不少报考大学的高考考生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机采访几名在读大学生获悉，尽管他们填报志愿时更多参考报考手册的录取分数线，但在同等情况下，许多考生和家长更多会参考学校的排名。尤其对分数够不上重点院校的考生更是如此。这也就是说，大学排行榜已经在大学招生中起了作用。

同济大学办学质量评估院副研究员樊秀娣表示，大学排行榜是较为“亲民”的大学评估方式，社会与许多院校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而直观的排名方式较好迎合了人们的需求。

张端鸿补充说，大学排行榜对社会声誉的提高和吸引考生方面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不断改进过程中又能吸引更多的生源和办学资源，变成滚动的良性循环，而一些学校示范效应也使很多大学觉得在排行榜排得好一些是有甜头的，因而越来越重视排名。

“热闹”的同时，也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操作大学排行榜的主体中，除了新闻媒体和高校、研究机构外，商业色彩浓厚的企业也是重要的主办者。国际知名的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国内的武书连版大学排名、麦可思大学排名和中国校友会大学排名，背后都有咨询机构等商业企业的身影。围绕着大学排行榜，已经催生出《挑大学 选专业》等填报志愿辅导用书、高等院校咨询服务业务等“变现”形式，俨然形成不小的产业链条。

“排名”反映“一流”成效？

近来，人们对“大学排名”有了更高的期许：当前国内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战略——“双一流”战略，“大学排名”能成为推动过程中重要的第三方评估标准吗？

事实上，“大学排名”已被吸纳进一些地方对接“双一流”战略的方案当中。例如《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就提出，到 2020 年，15 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其中 10 所左右高校进入前 50 名；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尽管方案未提及“全国百强”具体所指，而国内也没有明确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但业内共识是，类似 QS 世界大学排名将会成为重要的参考。

现在的问题是，QS 世界大学排名，以及国内繁多的大学排行榜，能撑起“评价参考”的功能吗？

人们质疑的焦点在于，既然“大学排名”是一门生意，会不会出现为盈利而扭曲结果的情况。这种质疑不无道理，早在 2009 年就曝出某西部院校向国内某知名大学排行榜机构出“赞助费”买排名的丑闻。

另外更深入的质疑，来自于业界对排行榜评估指标专业性的疑问。

其中比较典型的体现是，同样的高校在不同的排行榜中的排名有强烈反差。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在网大版和中国校友会版排行榜位居前十和前二十，在武书连版的排名中却排在三十几位；而在网大版排行榜位列第19位的武汉大学，在中国校友会版排行榜中高居第3位；让人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武书连版排行榜上，其母校浙江大学多年来排名在清华和北大之前，居全国第一。这与人们印象中的大学座次有很强落差。徐振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所以出现各种高校排名不同的情况，在于其指标体系的差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不同的大学排行榜指标设计各有特点。例如，QS排名更重主观性的同行评价，占据40%的权重，全职教师的人均论文应用率、师生比均占据20%，反映就业的雇主评价和反映学校国际化水平的国际师生比重均仅占据10%；USNWR排名侧重综合科研实力，论文数等文献计量学指标占去65%；THES排名则更加注重学术公信力，反映学术论文影响的论文引用率、研究的国际声望等研究指标分别占据32.5%、29.25%，其次为教学与学生指标，占据26%；AR-WU排名则更加侧重理工科的学术研究成果，其指标均为研究、论文指标。相比较而言，国内的武书连版排名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并重，但其学术研究指标属于总量指标。综合来看，大部分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侧重总量和科研成果。

徐振宇强调，这种只考虑规模、不考虑人均绩效的评价体系，有可能对高校传达错误信息。而评估数据不透明、文理科多类型高校混合排名的问题，也让人怀疑其科学性。这可能造成学校建设的“瞎指挥”。

张端鸿明确表示，现有国内的排行榜完全不可能成为第三方评估的一部分，商业组织目前所开展的排名还是从商业性的角度来做的，是商业性排名，转化成非政府组织非常困难的。每个商业组织没有来自财政拨款的力量，对自己的员工和经济效益都有很强烈的要求，意味着他们

必须按照商业的逻辑运作而不是公共逻辑运作。“还是在困局当中，大学排名其实需要很高的投入。在排名过程中，这些商业机构确实把并不完善的结果发布来影响高等教育，并且导致功利化倾向，让大学在此过程中饱受折磨。”他说。

不过，徐振宇认为，尽管当前许多高校还是看重排名，但已经没有前些年的狂热追捧，而逐渐进入反思阶段，仅是将大学排名作为学校建设的参考。

而作为大学排行榜的参与操作者，董克分析，排名指标体系的差别，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多还代表着一种学术观点。随着评估数据的逐步公开，大学排行榜在监测大学同时也接受社会监督。商业机构为了更好的市场反应，研究机构推动研究，都会就指标体系进行改进修正，例如他所在的团队就在考虑，排名指标兼顾规模和人均绩效。大学排行榜的未来应该会越来越接近真实情况，成为大学建设第三方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业内研究者并没有这么乐观。张端鸿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现在并没有很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评估，第三方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学校，代表的是社会上的专业组织。首先要独立于举办者，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与大学或排名机构或教育商业服务业务之间没有利益相关的关系。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对第三方的孵化和培育方面相当滞后。原来有些评估机构也有一定的专业性，但还需要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产生出来——多个评估结果来互相推敲，对于真正产生优质评估结果更有利。

各省“双一流”建设方案综述（一）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毕建宏

在国务院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方案》）之后，“双一流”建设替代“211”“985”迅速成为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按照《方案》所提出的“总体规划，分级支持”的措施，地方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在《方案》出台后，不少省份都以此为模板，制定本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还有一些省份早在《方案》颁布之前，就提出了本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或学科建设计划。本文就截至目前各地出台的这些方案或计划进行一些梳理，以便对全国整体的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各省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

在《方案》颁布之后，河南、海南、贵州、内蒙古等省份纷纷发布本地区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从方案名称可以看到，各地实施的方案有的大致相同，有的则有差异。贵州、内蒙古、河北等地与《方案》相同，都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宁夏提出“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河南、海南、云南、新疆等地则仅实施特色重点学科或一流学科或重点专业建设，甘肃、安徽提出“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江苏提出进行“高水平大学”建设，广西提出实施“高等教育强基创优计划”。

早在《方案》颁布之前，就有不少省份制定了本省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或学科建设计划。2014年10月，福建决定支持三所高校建设高水平大学；2014年10月，浙江发布《关于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的意见》，2015年，开展省一流学科遴选工作（2016年10月，出台《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和“一流学科建设工程”）；上海于2014年11月制定了《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决定实施上海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2016年1月，制定《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北京于2015年3月发布《北京高等学

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2015年4月，广东发布《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方案》，2016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科学科建设服务创新发展的意见》。

	省份	实施方案	发布时间
1	河南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2015年12月8日
2	海南	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建设方案	2016年4月8日
3	贵州	关于大力推进区域内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意见	2016年4月29日
4	内蒙古	自治区统筹推进国内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2016年5月16日
5	河北	关于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意见	2016年5月17日
6	江苏	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	2016年6月15日
7	广西	广西高等教育强基创优计划实施方案	2016年6月22日
8	甘肃	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2016年7月28日
9	陕西	关于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学院、一流专业”的实施意见	2016年8月17日
10	云南	云南省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2016年9月5日
11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三五”重点学科建设方案 自治区普通高校重点专业建设实施方案	2016年8月19日 2016年9月29日
12	深圳	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6年10月21日
13	宁夏	自治区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	2016年12月27日
14	山东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	2016年12月26日
15	湖北	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6年12月28日
16	安徽	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2016年12月28日
17	辽宁	辽宁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2017年1月3日
18	青海	关于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7年1月10日
19	湖南	湖南省全面推进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	2017年2月10日
20	山西	关于实施“1331工程”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意见	2017年2月26日
21	福建	关于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实施意见	2017年3月6日

除了以上省份外，其余省份在“十三五”规划等文件中也都提到要推进“双一流”建设或“高水平大学”建设，“双一流”建设方案也在积极准备和筹划中。如：《江西省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

实施方案》目前已审议通过，但还没有对外公布。2016年11月，重庆市教委通报“十三五”期间将实施“五项计划”，其一就是“双一流”建设计划；并将“发布《重庆市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列为2017年教育工作要点之一。2017年2月，黑龙江发布《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规划（二期）》，提出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加快制定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意见。吉林已将推进“双一流”建设纳入省“十三五”规划和教育“十三五”规划，并将在2017年出台《统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2016年12月，四川发布《四川省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提出统筹建设高水平高校和学科；四川教育厅将制定“双一流”建设实施意见列为2017年工作要点之一。2016年8月，西藏出台《关于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7年1月，天津市教委公布《天津市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可以说，“双一流”建设已经成为各地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而《方案》则起到了指南的作用。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这是对贯彻落实《方案》的进一步细化和延伸，对于各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落地也将起到指导作用。

“双一流”的建设目标

各省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都明确提出了建设目标，这些目标大多都比较详细，具体列明了到什么时候点，有多少大学和学科进入什么排名。

浙江：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支持浙江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施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到2020年，力争全省高

等教育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列全国省（区、市）前 6 位，10 所左右本科高校在全国同类型高校中处于前列。实施“一流学科建设工程”。到 2020 年，有 40 个左右学科进入全国前 10%、100 个左右学科进入全国前 30%；争取省属高校 ESI 前 1‰取得突破，一批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若干学科名列全国前 3 位。

上海：按照国际一流、国内顶尖、国家和区域急需的标准，分类建设、优化布局、凸显优势，重点建设一批高峰学科和若干高峰领域（方向）；围绕国家需求优化学科布局结构，凝练学科重点方向，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贡献突出、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高原学科群。

安徽：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持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建设一流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到 2020 年，重点建设 8 所左右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批优势特色学科专业，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重点建设 10 所左右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和一批品牌应用型专业，达到国内一流水平。重点建设 20 所左右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和一批紧密对接产业的高职专业，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北京：集中力量建设 20 个左右的高精尖中心，实施 50 个左右的高精尖项目。

广东：到 2020 年，重点建设高校综合实力排名大幅提升，达到或接近同类型“985 工程”高校水平，或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范围。每所高校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或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前三名的数量有所增加，较重点建设前至少新增 3 个以上学科领域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或 5 个以上学科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前 10%；到 2020 年，重点建设项目所依托主干学科的排名进入 ESI 学科排名前 1‰或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前三名或前 10%，已进入的排位明显上升或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范围。到 2030 年，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项目总体上实现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并带动全省高等学校整

体办学水平大幅提升，建成高等教育强省。

河南：2024年，5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行列；10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内前列，ESI排名进入前1%，或在权威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十名或前5%。

海南：2020年，5个及以上学科进入国内一流学科的行列，ESI排名进入前1%或在全国学科评估排名中进入前10名。15个左右的学科在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对接海南“12+1”重点行业、引领海南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大作用。

贵州：推动有条件的高校和学科专业进入区域前列或接近全国一流水平，一些具有冲击国内国际一流的能力和影响力的重点学科领域成为培养和造就科技领军人才的基地，服务区域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更加突出，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显著加强。

内蒙古：到2020年，全区有4至6所高等学校初步具备建设国内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内蒙古大学争取在2025年率先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中国史、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科学技术史、材料科学与工程（含稀土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含稀土工程、煤化工）、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畜牧学、林学、草学、蒙医学、蒙药学等学科进入国内一流学科行列，其中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生物学、蒙医学、蒙药学等5个左右学科争取进入国内一流学科前列。

河北：到2020年，3所左右大学达到或接近国家一流大学水平，一批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行列，个别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

江苏：到2020年，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其中10所左右高校进入前50名；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100个左右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1%；

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

广西：分批遴选若干所高校立项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国内高水平大学、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地方技术技能型高水平大学；支持具有博士点高校和博士授权点立项建设高校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学科；支持本科院校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使一批学科进入国内同类学科先进行列；分类重点支持建设优质专业；到2020年，一批专业进入国内一流行列，若干个专业进入国内一流前列或国际一流行列；分类重点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重点扶持战略性重点保护专业。

甘肃：“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50个左右学术水平较高、优势特色明显、服务能力强的一流学科，其中2-3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前1%或全国学科评估排名前10%，达到世界一流水平；15个左右学科（领域）进入ESI前1%或全国学科评估排名前20%，达到国内一流水平。6所大学进入国际国内同类院校高水平行列，3所高职院校进入国内一流高职行列。

陕西：到2020年，支持1-3所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5-7所高校达到国内一流大学水平；持续推进省属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快部分省属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支持若干个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支持30个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培育30个全国一流学科，持续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学科。

云南：到2020年，努力使云南高校学科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水平，力争5个左右的一级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行列；使一批一级学科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10%，且这些一级学科中至少有1至2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力争支撑获得2-3个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一批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或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新疆：“十三五”期间，重点学科建设总体数量为50个左右，其

中 10 个争取建成国内一流学科，争取进入全国学科排名前 30%，形成自治区重点学科的高峰；30 个学科争取进入全国学科排名前 50%，力争大部分建成博士授权一级学科，形成自治区重点学科的高原；建设 10 个特别扶持学科，面向交叉学科和边远高校，建成一级学科硕士点或专业学位点，形成自治区重点学科的新生力量。在全区本科高校建设 50 个重点专业，包括 10 个特色品牌专业、25 个创新创业示范专业和 15 个战略新兴专业。

深圳：坚持以打造高水平学科为基础，较大规模高校和特色学院建设并举，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同步推进，经过 10 年左右努力，建立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到 2020 年，5-6 所高校纳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到 2025 年，3-5 所高校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 50 名。到 2020 年，力争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前 10% 的学科达到 25 个以上，进入世界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前 1% 的学科达到 15 个以上；到 2025 年，进入教育部学科评估前 10% 的、世界 ESI 排名前 1% 的学科，分别达到 50 个和 30 个以上。到 2020 年，成为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区。

吉林：“十三五”期间，实施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吉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支持 3 至 4 所地方高校建设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进入国内同类大学一流行列；支持一批转型发展高校建设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在国内应用型高校中发挥师范作用；支持一批高职（专科）院校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院校；支持有条件的民办高校建设国内领先的民办大学。根据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重点支持一批优势学科率先建成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一流学科（A 类）”，巩固提升一批潜力学科形成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一流学科（B 类）”，持续支持一批建设目标明确、对接社会需求的亟需专业，积极打造品牌专业群（链）。

宁夏：通过重点建设，推动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相关学科分别进入国内一流和西部一流行列；推动宁夏大学率先建成区域特色鲜明、服务地方能力突出、西部一流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到2020年，在全国学科评估排名中，全区高校5个以上学科位列西部前20%，3个以上学科位列全国前15%，其中2个以上学科进入ESI世界学科排名前1%；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学评价排名中，宁夏大学综合实力进入西部地区高校前25名、全国前200名。

山东：积极支持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驻鲁部属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力争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或世界前列；积极支持省属高校争创国内一流，力争一批学科进入国内领先或世界一流。到2020年，全省高校有若干学科进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排名前10%；有50个左右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学科排名前1%，并实现进入1‰的突破；1-2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行列，6所左右省属高校每校有3个以上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学术影响力排名进入国内高校前100名，建成国内高水平大学。

湖北：到2020年，力争10所以上大学进入全国百强，至少5所大学列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6个以上的学科领域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1‰，20个左右进入前200位，70个以上学科进入前1%，在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占全国总数的10%左右，60个左右学科进入前5名，120个左右学科进入前30%。

辽宁：到2020年，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办学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5所省属高校进入全国高水平大学行列，5所进入行业领先研究应用型大学行列，5所成为全国知名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5个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30个左右学科达到全国一流水平，50个左右学科形成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起到支撑作用的优势特色学科。

青海：到2020年，努力在三江源生态、新能源、新材料、藏文信息与安全、高原医学、民族学等学科中，建成2个左右学术水平较高、优势特色明显、服务能力较强的国内一流学科，其中1个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实现零的突破。扶持建设一批独具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盐湖化工、高原生态旅游等新型产业以及与国家“一带一路”、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精准扶贫等重大战略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建成15个左右省级一流学科。鼓励各高校重点加强基础较好、特色鲜明、创新能力较强的基础性学科，积极开展校内一流学科建设，使高校真正成为我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重大科技创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

湖南：到2020年，40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前1%，45个左右学科进入全国前10%，50个左右应用特色学科进入全国应用学院同类学科的前列，50个高职特色专业群进入全国高职院校同类专业群的前列。在此基础上，争取3所大学进入国家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特色大学行列，5所大学进入国内一流大学或国内特色大学行列，5所学院进入国内一流应用学院行列，6所高职院校进入国内一流高职院校行列。

四川：《四川省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提出进行高水平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分类建设15所左右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300个左右“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主要体现三个层次：力争建设30个左右学科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学科（世界一流学科），100个左右优势学科具有全国竞争力、影响力的学科（国内一流优势学科），100个左右特色学科紧密契合、重点支撑四川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发展重大需求的学科（区域一流特色学科及高端新型智库）。

江西：遴选建设学科60个左右、专业100个左右。到2020年，力

争 10 个左右学科进入国内一流学科行列，个别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或前列；20 个左右本科专业进入国内一流专业行列；1 所拥有若干一流水平学科的大学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争取成为教育部直属研究型大学；3-5 所拥有若干个同类高校领先学科的大学排名位次明显前移，成为特色高水平大学；若干所高职院校成为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水平职业院校。

山西：基本建成规模合理、结构优化、布局科学、特色鲜明的山西高等教育体系，高校综合实力、办学活力、服务能力、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相关发展指标达到中西部省份先进水平，产出一批对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标志性成果。

天津：支持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支持市属本科高校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重点建设一批有较强学科积淀、总体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优势学科；瞄准学科前沿，搭建优质资源平台，重点建设实力较强的潜力学科；瞄准产业结构调整需求，完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机制，推进校企双向人才交流合作，重点立项建设与我市优势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型现代农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等紧密对接的优势特色学科（群）。

西藏：支持西藏大学进入教育部直属高校行列，进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原科学与技术两大特色学科群建设，把西藏大学建成特色突出、国内有影响力、国际有知名度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重庆：力争 2-3 所高校跻身国内一流、行业一流大学行列，建成一批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流学科。

黑龙江：建设 1 所世界一流大学，6 至 7 所国内同类院校一流大学，按照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支持 40 个左右的学科建成国际或国内一流的优势特色学科。

福建：到 2020 年，1 所大学建成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1 所大学综合实力排名进入全国前 50 名，1 所大学进入全国前 90 名，新增 2 所大学进入全国前 100 名；3 个左右学科进入全球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前 1‰、20 个左右学科进入前 1%，10 个左右学科在国内权威第三方评价中进入前 10%、20 个左右学科进入前 20%，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显著增强，高等教育整体办学实力明显提升。

“双一流”建设的经费投入

“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经费投入保障，不少省份在方案中都提到，对于“双一流”建设，省财政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并且列出了具体的投入额度。但根据财力的不同，各省市对“双一流”建设投入的力度也不同。总体上看，东部发达省份投入多，中西部发达省份投入少。

上海：上海市高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分两个阶段，2014-2017 年第一个建设阶段，市级财政预计投入 36 亿元，其中相当部分用于教师队伍建设；2017-2020 年第二个建设阶段，市级财政继续加大对高峰高原学科建设的投入力度，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北京：北京市财政持续稳定地对高精尖中心进行滚动支持，五年为一周期，每年每个中心（20 个）给予 5000 万至 1 亿元的经费投入，根据中心建设的实际需求安排预算；市财政设立经费对高精尖项目给予支持。

广东：2015-2017 年，广东省财政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共 50 亿元，支持重点建设高校 5 所左右，重点建设项目 15 项左右。

山东：“十三五”期间，山东省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加强资金统筹，多渠道筹集 50 亿元，积极支持“双一流”建设。

河北：从 2016 年起，“十三五”期间每年增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专项资金 5 亿元给予支持，连续五年，总计 25 亿元。

河南：为支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2015年—2017年，安排10亿元，2018年—2024年每年安排3亿元。

江苏：对进入全国百强的省属高校，江西省财政自2017年起统筹新增教育经费加大投入，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每年每校给予1亿元左右资金支持。

贵州：2016年—2020年安排不低于5亿元，每年不低于1亿元，扶持区域内一流大学和学科专业建设。

宁夏：从2017年到2020年，宁夏自治区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增加2亿元。其中，一流学科建设经费1亿元，宁夏大学西部一流大学建设经费1亿元。

新疆：“自治区重点专业建设计划”采取自治区财政投入和学校配套相结合的方式支持50个左右专业建设，五年为一个建设周期，自治区财政投入一亿元专项资金。

江西：江西省财政安排8亿元，统筹推进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

福建：“双一流”建设计划列入省“十三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十三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16亿元建设资金用于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建设资金根据实施情况逐步增加。

深圳：加快推进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对纳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的高校，建设周期内每所给与最高10亿元专项经费资助。对纳入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高职院校，建设周期内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对纳入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加大专项经费支持力度。培育30-50个优势学科参与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广东省高水平学科竞争，每个学科给与最高3000万元资助。列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和广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的，分别给与最高5000万元和3000万元资助。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如上海、甘肃、宁夏、辽宁、湖南等不少省份都在方案中提到，高校要多渠道筹集建设经费，扩大社会合作，形成多元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这也是《方案》所提出的支持措施之一。

主 办：山西省教育厅 1331 办公室

邮 箱：sxs1331bgs@163.com

电 话：0351-8723363

出版日期：2017 年 5 月 18 日（总第 02 期）

报：省政府楼阳生省长、张复明副省长、王纯秘书长、郭立副秘书长

送：各市市委书记、市长，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财政厅、人社厅、
国资委主要负责同志

发：各高等学校、教育厅机关处室、厅直属单位

（共印 200 份）